

【文学课】

大时代中的小家庭

——文贵良讲杨绛《我们仨》

杨绛的《我们仨》是一部怀念亲人的散文集，出版于2003年，那一年她九十三岁。

“我们仨”指的是杨绛自己、丈夫钱锺书和他们的女儿钱瑗。女儿钱瑗因患骨结核死于1997年去世，不到六十周岁。仅仅一年后，1998年，丈夫钱锺书又因病去世。两年之内，两位亲人接连离世，当时只留下杨绛一个人孤独地生活。杨绛把自己对丈夫与女儿的思念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因此这是一部写“死别”的书。生离死别中，“生离”还有团聚的希望，而“死别”再也没有团聚的可能。

“我们仨”这个标题来自杨绛女儿钱瑗的一篇散文的题目。

钱瑗在《我们仨》大题目下，列出了一组标题，依次如下：(一)父亲逗我玩；(二)母亲父亲教我读书；(三)“我们不想离开中国，不想做‘白华’”；(四)我犯“混”，大受批评；(五)父母互相改诗——他俩喜爱的游戏；(六)一次铭刻在心的庆祝会；(七)我得了新的“绰号”pedagogue，pedagogue是钱锺书给女儿取的雅号，中文意思是“学究呆鹅”。(pedagogue由pedagogue一词加上goose演变而来，前者的意思为有学问的教师。)

小题目到此为止，这是钱瑗去世前还在写的文章。杨绛的《我们仨》是完成女儿没有完成的写作，借用女儿散文的题目，把女儿没有写完的文章继续写完，这是作为文学家的杨绛对丈夫和女儿的最好纪念。

《我们仨》这部散文集分为三部分，第一部分《我们俩老了》，很短，相当于小说的序幕。第二部分《我们仨失散了》，类似小说笔法，写一个梦。第三部分《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》，这才是主体部分，记叙“我们仨”六十余年的共同生活。

杨绛称她的家是“不寻常的遇合”。“遇合”就是相遇组合；“不寻常”就是平凡而不平常。不平常指的是，他们三口之家在20世纪中国那些惊涛巨浪中是如何平安度过的。

《我们仨》的主体部分从杨绛与钱锺书出国写起，时间在1935年8月。1937年5月，女儿钱瑗出生在英国的牛津。然后一直写到1998年12月钱锺书去世。前后跨度六十多年。这六十多年中，中国处在大变革的大时代中。

在这样的大变革中，中国不知有多少家庭在演绎着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杨绛的“我们仨”，却是相聚的时候多，分离的日子少。经受了时代风雨的冲刷，没有遭受太多的政治打击，平平安安。这对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来说，非常难得。

他们坚持一种沉默姿态。这就如钱锺书的字——默存一样。默存，即默默地生存。因为默默地生存，所以能平安地生存。因为平安地生存，所以能长久地生存。有人批评他们作为知识分子，没有对社会中的不合理提出批评和抗议，只是明哲保身，不足为训。对于这一点，钱锺书也有自我反省。他在给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写的序言中，认为杨绛漏写了一篇《运动记愧》，这“愧”就是愧疚。不过，他们没有为了保全自己，去造谣诬陷他人，去落井下石。就此而言，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底线是保存了的。

杨绛一家是大时代中的小家庭：在大时代的暴风巨浪中，成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，相对坚实的岛屿。这是温馨的一家、和睦的一家。

杨绛和钱锺书都是知识分子，都很有个性。学会妥协和包容，是构筑温馨的基本条件。钱锺书才华横溢，但现实生活能力比较低，他分不出左右。杨绛喜爱钱锺书，既要能欣赏他的才华，又要能忍受他的笨拙。杨绛在英国生女儿，住在医院里。钱锺书这段时期一个人过日子，每天到产院探望，常常苦着脸说：“我做坏事了。”而杨绛每次都是鼓励。这份容忍是保持爱情持久的溶液。

抗日战争中，钱锺书回到上海与杨绛、钱瑗团聚，接到父亲钱基博从湖南寄来的信，要钱锺书去湖南一所国立师范大学任英文系主任，并侍奉父亲。当时，钱锺书被西南联大聘任为英文系教授。该如何选择？钱家的人都主张钱锺书去湖南，与父亲一起工作，钱锺书不敢违抗父命。独有杨绛认为，钱锺书父亲身边一直有人侍奉，并不需要儿子过去。钱锺书当时就任西南联大教授，学校并没有解聘他，应该去西南联大。但最后，杨绛还是妥协了，钱锺书去了湖南。

即使是最幸福的家庭，也免不了病痛和死亡。丈夫和女儿都病了，两人住在不同的医院。杨绛在两个医院之间奔波。如何来记叙这段痛苦的日子，见证亲人离开人世的最后岁月？杨绛采用艺术的表达方式，把丈夫和女儿生病最后离开人世的过程化为一个“万里长梦”。这就是《我们仨》的第二部分。亲人病重，无论对哪方都是一场噩梦。但杨绛的所谓“万里长梦”，也不排除暗示着亲人病好的希望。那场生死离别的过程，对活着的人来说，恍如梦中。把现实生活、对亲人思念而产生的梦幻般的感觉结合起来，把亲人去世的过程写得迷离恍惚。

1981年，杨绛一家搬入三里河寓所，他们拍照留念，还有题记：“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。”可见搬入三里河寓所，他们一家无限欣喜。可是等到女儿与丈夫先后离去，对于老人杨绛来说，亲人没有了，家的温馨没有了。杨绛写道：“三里河寓所，曾是我的家，因为有我仨。我们仨失散了，家就没有了。”“不过三里河的家，已经不复是家，只是我的客栈了。”

杨绛把三里河寓所比喻为“客栈”自然寄托着对丈夫和女儿的浓浓思念，这是对于他们一家曾拥有的美好过去而言。相对于当时的杨绛来说，客栈的比喻则另有含义。既然三里河寓所是客栈，那么杨绛自己就是旅客。既然是旅客，她的旅途总有一个终点。杨绛知道这个终点是什么，但没有明说。

神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曾有一句名言：人生在世，不过是过路的旅客。也许，在阿奎那那里，过路的旅客最终将迎接神的到来。而杨绛把家作为客栈，把自己视为旅客，或许暗示着最后将去另一个世界与丈夫和女儿团聚。

(文贵良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。)

【阅读记忆】

我与《读者》的故事

□于洪良

最早与《读者》(当年的《读者文摘》)结缘，还是1983年7月的一天。那时刚自华东石油学院[今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]毕业即将留校任教的表哥，带着小学毕业的我去了他的大学校园。正值暑假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合堂阶梯教室，看到了宽阔的运动场，走进了上下铺的大学生宿舍。这在一个农村孩子的眼里，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多彩的世界啊。在表哥的床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《读者文摘》，好几本整齐地排列在小书架上。当时，表哥给我打气说，以后你上了大学也可以多读读《读者文摘》。他说这句话的神情，至今印在我脑海里，恍如昨日，挥之不去。

后来读初中、高中，参加高考，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看《读者文摘》，偏远的小县城能有几个人自费订阅呢？但是，我一直没有忘记表哥的话，考上大学就能读到《读者文摘》了。

1989年秋天，我迈进了大学校门。不久就发现图书馆的阅览室有《读者文摘》，眼前一亮，如获至宝！从那以后，掐着时间盘算，新的一期何时上架，争做“第一读者”，甚至因此还和当时的那位图书馆烫发女馆员混熟了。大学四年，记得有几次，发了奖学金或者来了稿费，还“大方”地跑到校外的小邮局去买《读者文摘》。回到宿舍后，忍不住在同学面前“漏”一下，当同学想借阅时，心里唯恐人家给弄丢了。

1993年，大学毕业的我来到省城的一所大学工作。领工资了，买一本《读者文摘》自然是“小菜一碟”。到年底，单位统计个人自费订阅报刊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报：“我订一份《读者文摘》”。至今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，这年10月的一天，办公室那位白头发的经济学教授嘟囔了一句，“《读者文摘》改名《读者》了，知识产权很重要啊”，那神情可深沉了。

又过了两年多，认识了女友，也就是现在的妻子。谈恋爱之初，一聊得知，她也爱看爱买《读者文摘》，家里已经存了好几十本了。呵呵，都喜爱同一本杂志，缘分啊。当时一起逛街时，街头的报刊亭里，最显眼的地方一定摆着亮丽的《读者》，看见了就买。结婚后，她把几十本《读者文摘》都从娘家带到了我们的小家，成为我们新家小书架上的“贵客”。

再后来，工作、生子、家长里短，时间匆匆而过。但是，每年下半年订阅报刊时，我和妻子都互相提醒对方，别忘了订《读者》。每每拿到新一期的刊物后，都是先睹为快，有时还就某篇文章聊聊天。女儿上幼儿园时，每天晚上的床头故事，我们也从《读者》中挑选。她上小学、中学后，也模仿我们看《读者》，甚至手不释卷，摘抄“好词好句”，吃饭都得叫几回；后来她的语文成绩不错，作文写得有板有眼，这应该有《读者》的功劳吧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养成了两个习惯，其一，打开新一期的《读者》，先看“言论”，总感觉每一条都短小精悍，犀利独到，甚至让人莞尔一笑，回味无穷。其二，坐飞机或高铁出差时，总是习惯往包里装上一两本《读者》，一是图方便轻巧，再就是显得有“文化范儿”，你想，一个安静地坐在那儿看《读者》而不是打游戏玩手机的人，多高雅。

参加工作30年来，不管我们的住房是一居室还是两居室，到现在的四居室，不管有没有电梯，书橱是大还是小，我们每一次搬家时，总是先把《读者》安顿好，一本也不能少，一排排一列列居于书橱的显眼位置，取放方便，随时可读，汲取养分，形影不离。

近些年来，还有两件难忘的事。一是2011年的6月下旬我去兰州开会，会间不得脱身，到第三天即将返程，中午12点多的航班。一早我跟同行的人说，我出去办个事。随即打出租车匆匆赶到了位于读者大道568号的《读者》编辑部。在那座向往已久的别致小楼里盘桓好久，看楼道里的宣传图片，听办公室里编辑们的谈话声，甚至想敲开总编的门进去聊几句……最后在一楼买了六卷本的一套《1000个故事——〈读者〉30年最美的风景》，用绳子打捆，坐飞机带回。同事调侃说，在网上买多省事儿。我执拗地说：那不一样，这可是原汁原味。另一件事是，2016年9月我在北京昌平参加全国行业报社社长总编辑培训班，听富康老总给我们讲课，畅谈《读者》的办刊之路以及转型谋划，真是过瘾解渴！课间休息时的近距离交流，更是幸运至极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《读者》早已不仅仅是一本杂志，更像是一位经年老友，默契知音，不离不弃，厮守为伴。捧读《读者》，让人心静，让人享受，让人思考，而且值得一读再读。尤其是在节假日，在夜雨敲窗、寒雪飘飞的夜晚，香茗氤氲，安静地与《读者》对视晤谈，享受一份惬意的时光！40年弹指一挥间，《读者》以其独特的高雅、清新、隽永品格，伴我走过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乃至永远的成长记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，山东财经大学教授。)